

“山—海”之间的文化意识与无意识

——文本“谱系”中的《在山的那边》

李祖德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在山的那边》一诗的“信念”主题是在经典化过程中和特殊的文本“谱系”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进一步考察该诗的文本“谱系”,并将此诗重新归置于“八十年代”或“新时期/文学”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可以打开其“信念”主题之后不同寻常的隐秘的文本空间。此诗在“山—海”对立的结构形式中表征了“八十年代”“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缺失或不满,即“求诸于外”的文化意识与精神“失父/寻父”的无意识。

关键词:《在山的那边》;“山”;“海”;“求诸于外”;文化意识;文化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3-0047-09

10.19742/j.cnki.50-1164/C.220305

文学经典化不仅促成“经典”文本,通常还会引导或潜在地规范某一“经典”文本的阐释。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一诗正是在经典化过程中,尤其是经由中学语文教学和公共媒体的建构,才逐渐确立起了其有关“信念”的主题:“超越现实困境”“执着于人生理想”。而文学的经典化往往又是在特定的语境和文本关系中进行的,如果考察这首诗在经典化过程中所处的文本网络或“谱系”,并追踪其内容和表意方式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原有的一些“复杂性”在经典化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被隐藏、过滤和转移了,从而引导了现有的主题阐释。将这首诗重新归置于“八十年代”或“新时期/文学”的语境,可以打开它不同寻常的“诗性/意义”空间。

一、文本经典化、“谱系”与“信念”主题的确立

(一)文本的经典化及其“谱系”的形成

若以诗歌“应有的”凝练性、跳跃性、音乐性等文体特征,或现代诗歌的多义性、含混性、反讽性等“惯例”或“标准”衡量,《在山的那边》的确很难算得上一首“标准的”或读者审美习惯和期待中的“好诗”。诚如作者曾说:“今天重读这首诗,我当然感到了它在艺术上的稚气。”^{[1]165}《在山的那边》无论是主题的表达呈现,还是意象的营构、词句的锤炼等诸多方面,的确甚为“稚气”。在诗人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探索中,其诗歌的语言、经验和诗艺的“复杂性”以及“难度”都远远超出了这首诗所能达及的程度。

收稿日期:2021-11-23

作者简介:李祖德(1975—),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研究”(14XZW023)。

然而,自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后,这首诗就开始在中学语文课堂中被教师反复讲解,被学生反复阅读和记诵,由此在广大青少年诗歌读者心中“扎下了深根”。除此之外,这首诗还被一些公共媒体作为富含“正能量”的诗歌范本广为推介,以诗歌朗诵、晚会节目、诗歌电视(PTV)、文配图、PPT或短视频等多种文本/文体形式反复演绎和“转译”,从而为众多读者熟知。无需赘言,除了文学批评、文学史筛选与编撰之外,中小学文学教育和公共媒介的传播亦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语文教育和公共媒介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在山的那边》一诗显然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从而获得了它作为“经典”或“名作”的名声。同时,这首诗作为诗人自选集《蓝星诗库·王家新的诗》中的开篇之作,也自然显示出它之于作者本人重要而特殊的“指示”意义:“因为诗歌指给我们的道路,其漫长和艰辛,都远远超出了我在年轻时的想象。”^{[1]165}因而,在充分经典化之后,《在山的那边》在语言、经验、情感和诗艺上的“稚气”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学和文本技艺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症候,或者是一个有待考察和解释的“历史”问题和“诗歌史”问题。

这首诗在作者“个人诗歌史”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它作为诗人最初的履迹,不仅见证了诗人的成长,还给他指出了“漫长和艰辛”的诗艺和精神探索的未来之路。而正是在诗歌本文的经典化过程中,带着不无“稚气”的《在山的那边》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国当代诗歌史”。对于一首名作,持“经典”标准阐释其内涵固然重要,但其“经典化”的过程本身及其携带的问题同样重要。因此,正是在文学和诗歌“经典化”的问题视域中,我们理应让《在山的那边》重新回到它所处的时代以及文本的“谱系”之中,在“新时期/文学”或“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想与文化语境中重新获取并呈现它的问题性和意义。

在这首诗中,“超越现实困境”或“执着于人生理想”的主题包含“超越”“寻找”等“励志”内涵,这些内涵支撑着“信念”的总主题。除了中学语文教学和公共媒体的推进,文本的修改与更替也直接影响到这一主题的建构,并参与《在山的那边》一诗的经典化。在这首诗经典化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历时性文本/版本不可忽略:一是1981年发表于《长江文艺》的“原版”(简称“原版”)^{[2]49};二是2001年6月收录于《蓝星诗库·王家新的诗》的版本(简称“人文版”)^{[3]3-4};三是2001年7月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的版本(简称“人教版”)^{[4]2-3}。从发表、出版的时间上看,这三个互有差异的历时性文本显然构成了一个具有版本考订价值的文本序列。另外,它们还与中学语文教材编选的相关说明、教师的课堂阐述、公共媒介的演绎、作者关于《在山的那边》的自我阐释,一起构成了一个颇具复杂问题性的文本“谱系”,从而引导着并不断地“规范”这首诗的主题建构与阐释。

(二) 文本的修改、更替与“信念”主题的生成

这一“信念”的总主题当然主要来源于诗歌本文自身的信息,尤其是广为读者熟知的“人教版”。但如果进一步追究这首诗的文本“谱系”,并考察文本的修改,我们可以找回这首诗在经典化过程中流失的,或被隐藏、转移的那些“重要”信息和意涵。如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显现或“复原”《在山的那边》原有的丰富性、不透明性或“复杂性”,另一方面可以尝试揭示这首诗的“信念”主题是如何被“生产”和“建构”起来的。整体上看,这三个文本/版本在内容结构以及分节、分段的安排上并未做变动,皆为两个部分,共六节,主要的差异在于词语、标点和一些语句的修改、增删和调整。

其中,第一处较为重要的修改体现在第一节中,“原版”第一行中的“痴想”一词后即行末使用的是冒号,而后来的“人文版”和“人教版”删除了冒号,在第二行开头新增了破折号。比较而言,破折号比冒号更为“自然地”引出了“痴想”的具体内容,而且破折号在视觉上的“连接性”或“连贯性”也表征了这一“痴想”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特征。第三行中,“原版”和“人文版”皆为“妈妈给我说过海”,“人教版”则改为“妈妈给我说过:海”。显然,此处的冒号则更为“坚定有力”地显示了“妈妈”的态度的确定性,也强

调了“海”之于抒情主体“我”的重要性,因为那是“妈妈”指示给“我”的生命/人生方向,当然也暗示了诗歌后文中“我”在“山—海”之间的主体选择。

第二处较为重要的修改在第二节第一行中,“原版”中为“隐秘的愿望”,而“人文版”和“人教版”皆改为了“隐秘的想望”。如稍加揣摩,我们便不难发现,“想望”一词比“愿望”至少在语感上更多了一些“陌生化”的信息,“想—望”的组合在语义及语义引申上也具有了一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想望”一词的上声(xiǎng)与去声(wàng)声调组合和同韵(ang)关联又使得它在情感、态度上具有了某种主体性和能动性,也激发了这两个字的信息与能量,无论在语感、语义和情态上都比“愿望”“向往”或“想往”等近义词更为增色,在情感意向上也更为坚定有力。“想”和“望”用不同声调和情绪/情感指向了同一个“韵”,或者同一个“向往”的对象,并经由“海”关联了上文中的“痴想”:因为“想望”的“隐秘”和“想望”一词本身的“复杂性”,这一组合也显示出了“痴想”本身的“隐秘性”。虽然一开始就有了“妈妈”所给的明确答案,但“我”的“痴想”仍然是晦明不清的。

第四节中,“原版”为“在山的那边,是海,美丽的海!”一行,“人文版”改为“在山的那边,是海! /是美丽的、用信念凝成的海”两行,“人教版”则进一步改为“在山的那边,是海! /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两行。虽然“美丽的”在经典的诗歌语言和表意策略中似乎更“诗意化”,但也很显然,它已僵化板结,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抽象“语言”,而非生动的、个性化的“言语”,对于这首诗而言已属多余,也显得苍白无力。“用信念凝成的海”则较为抽象,它明确地宣示了“我”在遭遇现实打击之后仍然做出的主体决断。在第五节中,“原版”第一行中的“我竟没料到”,“人文版”和“人教版”改为“我竟没想到”;“原版”第二、三行为“一个幼时的信念/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人文版”改为“一个幼时的意念却扎下了深根”一行,“人教版”第二、三行则改为“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此处,“种子”一词显然比“信念”或“意念”更具形象性和信息的丰富性,也和上文“痴想”和“隐秘的想望”形成了结构上的照应和意义的关联,从而使这首诗的文本具有了颇为细致的内在肌理。第七行为“因为我听到海就在远方为我喧腾”,“人文版”第六行改为“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人教版”第七行则改为“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增加“依然”一词不仅展现了“海”的某种主体性,还暗含了“海”之于抒情主体“我”的某种“期待”“召唤”或“亲密性”,也进一步显示了“种子”带给我的力量,从而凸显了抒情主体对“海”的信念。

第三处较为重要的修改体现在第五节最后两行中,“原版”第八、九行为“那雪白的海潮啊,沿着无形的河道/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人文版”第七、八行改为“那雪白的海潮啊,远远而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萎的心灵……”,“人教版”第八、九行则改为“——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沿循诗歌上文的抒情线索,“人教版”中“夜夜奔来”“枯干”等处的修改,更进一步凸显了“我”的信念和“海”的主体性,从而使这首诗在语义、情感、逻辑上保持了整体上的一致性和贯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原版”中“沿着无形的河道”本是诗歌本文中为数不多的颇具“诗意”和“复杂性”的语句之一,但在“人文版”和“人教版”中都被删除了。“无形的河道”无论是在诗歌抒情主体的想象和陈述中,还是在读者共通的语象经验中,都联结了“山”与“海”或“内”与“外”。删除之后,“山”与“海”的对立性明显增强了,而“海”的多义性、象征性和超越性则随之减弱了,“海”由此才真正成为“我”“遥不可及”但又坚守如一的“信念”。很显然,删除“沿着无形的河道”一语既强化了“山—海”意象之间的对立,也凸显了“海”作为“人生/生命理想”象征的意义,从而更清晰地指向全诗的“信念”主题。

至第六节中,“原版”第一、二行为“在山的那边,是海吗? 是的! /人们啊,请相信——”,“人文版”第一、二行改为“在山的那边,是海吗? /是的! 朋友,请相信——”,“人教版”则改为“在山的那边,是海

吗? /是的! 人们啊,请相信——”。“原版”第四行为“你终会走上这样一座山顶”,“人文版”改为“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人教版”则进一步改为“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两行。语序、断行、用词和语句的调整,尤其是“人教版”所增补“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一句,都显示了抒情主体在“山—海”的对列与对立中执着于“海”的主体选择,也使从“痴想”到得到答案,再到失望,最终到确信,并呼吁人们相信的情感/思维逻辑更为完整、明晰,从而建构了这首诗的“信念”总主题。

(三)文本“谱系”的合力与“信念”主题的确立

从文本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的“信念”主题经历了不断提纯和建构的过程。而中学语文教材编选者的选文意图和单元设计是“规范”这一主题的另一重要动因和策略:“编写者在选文时既照顾到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又着力开发具有较强的人文性、艺术性的新课文,也就是将经典性与教育性尽可能统一起来,如第一课是新诗《在山的那边》,应该说,它并不是新时期最好的诗作,也不是诗人成熟期的作品,但从思想教育、心灵感悟方面说是难得的佳作,尽管是自读课文,还是把它放到了全书的开篇。”^[5]在教材的内容结构的编排设计中,这首诗所属的内容板块和单元主题定位于“人与自我”,显然,编选者强调的是这首诗对于读者(尤其是中学生)的生命和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意义,强调的是“海”的象征意义和“信念”主题本身,而不是这首诗的文本“本身”,包括它的“稚气”和“复杂性”。

与此同时,收入中学语文教参的《〈在山的那边〉导读》^[6]¹⁶⁶一文以及作者的创作自述文章《山那边的海——关于〈在山的那边〉》,构成了这首诗“信念”主题的另一重要的“规范”因素。两篇文章,尤其是导读文章从“山”与“海”的对立“明确”了这首诗的“信念”主题,对教师的教学设计及课堂阐述有着极大的“引导”“限定”和“规范”的影响。除此之外,作者另有三篇同题文章即《从前有个少年》^[7]《从前有个少年——关于〈在山的那边〉的写作》^[8]《从前有个少年》^[9]先后发表于面对中学生读者的刊物,这三篇文章思路、结构不尽相同但内容基本相近,都从“文革”时期作者的童年经历和生活经验回顾了这首诗的创作灵感和意念的由来。这对“信念”主题及其阐释模式和教学设计具有明显的“规范”和强化作用。

综观这一文本“谱系”,作者对诗作文本的修改、更替促成并逐渐提炼、明确和“深化”了“信念”主题;教材编选者的设计、教参对主题的引导为《在山的那边》的“信念”主题确立了“可靠”和“正确”的阐释方向;而作者的创作自述则为这一主题的阐释铺垫了“真实”而“丰富”的经验基础。这些文本及其阐释话语,通过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和公共媒体(包括中学生刊物)的机制,展开了“信念”主题及其教育话语的实践和运作,从而建构了读者和社会公众对这首诗及其主题的“共识”或“刻板印象”。

二、“信念”主题下的多重文本空间

(一)“山—海”的诗性/情感/意义空间

除了文本“谱系”的引导和“规范”,有关“信念”的主题阐释当然主要得益于《在山的那边》中由“山”与“海”建立起来的“空间”或“结构”。全诗整体上遣词造句趋于散文化,语义逻辑也甚为清晰、畅通,一、二两部分之间也显示出了由叙述、置问向抒情(或议论)的明显转折,由此“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了诗歌的情感与主题:抒情主体表达了超越“山”及其象征的“现实/精神困境”的决心,以及执着于“海”及其象征的“人生/生命理想”的“信念”。

不过,正是由于意念和主题推进的急促以及表意的充分“透明性”,这首诗又显得感性、情绪不足。而在意义和审美层次的承转与递进上,一、二两部分之间的转折也更多地起着结构全诗的功能,并没有

显示出特别的“节奏感”和明显的“起承转合”关系。显而易见,这首诗主要以“山”与“海”这两个自然或地理意象的“对列”和“对立”建立起了基本的内容结构,进而建立了一个颇为新颖别致的抒情/叙述结构。在此“空间”或“结构”中,抒情主体对“海”表达了特别的情感 and 价值倾向,从而奠定了这首诗的主题基调。

“山”与“海”也由此建构了一个颇为清晰、透明的诗意、审美和想象空间。诚然,在古今汉语诗歌中,关于“山”和“海”的想象与抒写并不少见,也较多倾向于“言志”的主题,但像这首诗在“山”与“海”之间建立起一个意象对立结构的诗作却不多见。抒情主体“我”正是在“山—海”的意义张力关系中传递着他的意念和情感,从而使“山—海”由原本清晰、透明的空间衍变成一个颇具“复杂性”的情感和意义空间,也使其已经确立起来的“信念”主题具有了一定的含混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二)“山—海”的“文化—心理”空间

《在山的那边》“原版”发表于1981年,而在《蓝星诗库·王家新的诗》(“人文版”)中,这首诗落款日期为1979年。这正值“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潮流崛兴的时代,也是“新时期/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深化”主潮奔涌的高潮阶段。在现代汉诗写作领域,“朦胧诗”不仅以苦难、悲剧意识建构了一个启蒙先知主体的形象,还以批判的姿态建构了“人/个体”主体的想象。但“朦胧诗”或“新诗潮”,以及“归来者”并非只是将诗歌抒情主体的“大我”转换为“小我”,就算完成了它的历史/政治使命和诗学建构,在建构“人/个体”主体的同时,“朦胧诗”也建构了走出历史“黑夜”与“迷误”的“一代人”的主体形象(如顾城《一代人》)。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主潮一道,“朦胧诗”在去“政治化”和“革命化”的同时,也建立起了另一种文学的、抒情的美学化的或诗意化的“政治性”以及“宏大叙事”,以“人/个体”主体的苦难经历和自然、历史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同建构了另一种“民族/国家”主体想象——和“我”一样历经过自然、历史的沧桑与苦难命运的“民族”或“祖国”,如江河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的《大雁塔》《诺日朗》等文本都无不隐含着“小我”与“大我”的交融与同构。质言之,“人/个人”“一代人”“民族/国家”这三重主体形象构成了“朦胧诗”以及“新时期/文学”基本的主体想象结构。

在这一文学和历史语境中,无论是1981年还是1979年,都给《在山的那边》打上了鲜明的“新时期/文学”或“八十年代”的标记。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强行将这首诗“塞入”“新时期/文学”特定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而是说,在经典化之后,我们不能再封闭于文本“本身”,滞留于抽象而普遍的“信念”主题及其阐释模式。让这首诗“重新回到”中国当代诗歌史和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并且回归到它恰当的位置,是为了呈现它的问题性,并试图寻获更多、更新的能量和意义。就“信念”主题本身而言,作为纯粹的“人/个体”抒情主体,“我”在“山—海”之间的“痴想”、寻找、失落与决断,已充分显露出了“朦胧诗”在“八十年代”或“新时期/文学”重建“人/个体”主体的焦虑与愿望。至于这首诗的作者本人,虽然被广泛地视为“第三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但从诗人创作的阶段性来看,“王家新在朦胧诗潮方兴未艾时,与朦胧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关联”^[10]。诚然,对于彼时的《在山的那边》以及作者而言,“八十年代”并非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但从反向的角度看,“八十年代”及其情感结构已经嵌入或者“溶解”于这首诗颇为“稚气”的语言经验与诗意想象之中,甚至作为某种“无意识”支配着的它的情感、表意以及言语形式。抒情主体“我”,虽然已变成了“小我”,但同时“小我”也作为“同时代”或“一代人”抒情主体被投射而存在着,而且言语着,甚至是“小我”被“同时代”言说着。也就是说,在被充分“经典化”之后,《在山的那边》已经回溯性地和“新时期/文学”或“八十年代”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历史关系和意义关系,并渐渐显示出远非普遍而抽象的“信念”主题所能涵盖的问题性。进一步说,在其文本的“谱系”中——“新时期/文学”或“八十年代”是它的“文本语境”和不可忽略的另一“潜文本”。因此,诗中的

“山”与“海”又作为象征意象,建构了一个萦绕着隐微复杂的“八十年代”气息的“文化—心理”空间。

三、“山—海”之间的文化意识与无意识

(一)“山—海”中的问题意识

如前文的分析所示,诗中的“痴想”“隐秘的想望”“种子”“无形的河道”等词语已经清晰地显示了诗歌抒情/叙述主体的情感线索和情感逻辑:抒情主体从“痴想”出发,展开了对“山”外世界的追问,针对“妈妈”的答案,经由“质疑”“失望”而完成了最终的确信。诗歌以此完成了“信念”主题的表达,但抒情主体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出“痴想”和“想望”何以“隐秘”。这固然可以视为一个诗歌写作者语感和语言经验、习惯的问题,但这正构成了重新解读这首诗的问题意识,其间也隐含着这首诗“稚气”中的复杂性和难题性。可以看出,诗歌本文的修改和主题提炼在试图清除原有信息和经验的一些“复杂性”的同时,也保留或增添了一些新的“复杂性”和“含混性”。因而,这些词语成为了新的分析“通道”(access),我们可以经由这些“通道”重新打开《在山的那边》的多重文本空间,以揭示它和“八十年代”或“新时期/文学”的关系。

我们不妨依据这些词语继续追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想望/愿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又那么“隐秘”?第二,作为现实困境象征的“山”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理想与信念的“海”又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诗中抒情主体追问的为什么是“妈妈”,而不是“爸爸”或“父亲”?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信息“榨取”,或许可以让它们渗流出更多的意涵,以显示被“信念”主题所掩蔽的“文化—心理”空间和情感结构,发掘其“复杂”的情感、意识或无意识。

第三个问题及其设问方式看起来可能有些荒诞不经,但它们显示了文本中“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关系。一个文本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本身就携带着未曾承载和说出来的信息,“妈妈”的“在场”当然意味着“爸爸”的“不在场”,但这同时就意味着“爸爸”或“父亲”作为一个问题和某种特殊意义的“在场”。“妈妈”或“母亲”是古往今来的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中司空见惯的抒情或叙事对象,几乎已成为一种基本的抒情/表意策略或经验模式,甚至是现代诗歌的一种“无意识”。在我们的文学文化经验和伦理生活中,“妈妈”意味着生命成长的庇佑、呵护与陪伴,乃至乡愁般的生命与情感依恋。但在很长一段以“父权制”为基本结构的人类文明、历史与文化的进程中,是“父亲”提供给了我们生存的基本来源和保障,同样也是“父亲”带领我们走出了“想象界”的谬误“镜像”,并带着我们走进了“象征界”和社会世界的丛林,并赋予我们以生存能力和精神力量,因为“父亲”,我们作为主体的身份才真正得以赋形而且赋义。因此,在生命、成长的隐微层面,“爸爸”或“父亲”的“不在场”以及“我”小时候的“痴想”,无不意味着“我”的主体想象中“父性”身份和精神的残缺。事实上,“妈妈”和“我”都未曾见过大海,而当“妈妈”告诉“我”那是和“我”习以为常的“山”不一样的“海”时,“我”由“痴想”而生的“想望/愿望”才会如此“隐秘”,也才应该如此合乎逻辑地“隐秘”。诗中的“海”作为能指和表征,指向了“我”作为“人/个体”主体身份的不满与残缺。

因此,打开“妈妈”一词背后“隐秘”的文本空间,《在山的那边》就渐渐显露出了抒情主体的身份焦虑及其无意识症状,也渐渐展开了它关于抒情主体文化与精神“寻父之旅”的抒情与叙述。然而,抒情主体要寻找的是什么样的“父亲”?一层意思可以理解为现代人自我的主体身份焦虑。作为本体—生存论意义上的“人/个人”主体,在上帝隐去或“父亲”不在场的“现代性”生存困境中,“一座座山”便构成了现代人生存和精神困境的隐喻,所以才需要一个想象性的“父亲”维系“我”在世的生存。这个替代性的“父亲”形象就是在“山”那边的那个蔚蓝色的“海”,他的“雪白的海潮”、壮阔的景象、博大的胸怀

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此在的“我”，并日夜滋润着我的“干枯的心灵”。伴随着对“海”这个他者的想象与认同，“我”渐渐长大成人，日渐成熟而且坚定。

在“信念”的主题阐释和“山—海”的对立结构中，第二个问题已有了明确的答案。问题和答案都如此简单，但一些未曾显现出来的相关问题却又很复杂：“山”不好吗？又为什么不好？我们为什么不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建立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或者就在群“山”之巅俯瞰大“海”？

无论在中国诗歌和文学传统中，还是在自然地理学、人类交流史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叙述中，“山”与“海”之间其实并不构成天然的、本质的对立。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基于人类历史、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平等关系的一种“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和意识形态建构。自人类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西方）开启了以全球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现代性进程，人类历史由此进入了所谓的“海洋时代”。然而，地理的发现同时也伴随着“知识/权力”的话语建构，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中，是以“海洋”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规划”了近现代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也“规划”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进程”。

（二）“失父/寻父”的无意识与独特的文化意识

我们可以循此理解回到上文所提的第一个问题，作为审美与情感想象，《在山的那边》中“山”与“海”的“对立”显然也与这种历史、文化想象和意识形态构成的一种意义的同构或者“对位”，它表征了“八十年代”的一种尤为复杂和特殊的“隐秘的想望/愿望”。如前所述，“隐秘”和“想望”等语汇，尤其是“想”与“望”的组合保留了现代诗歌语言的“晦涩”“复杂性”或“多义性”。那么，诗中抒情主体“我”到底在“想”什么？又在“望”什么？是“海”吗？在诗歌的表层信息和语义逻辑中，“我”所“想望”的当然就是“海”，但既然“想望”的意念和对象如此明确，又何以如此“隐秘”呢？此诗的“症状”正在于此，而不在于“我”对“妈妈”的答案所产生的疑问。因此，在这首诗的深层结构和信息中，“隐秘的想望/愿望”所指涉的很显然又并非“海”本身，而是“雪白的海潮”“一个全新的世界”或“喧腾”等由“海”所携带的事物、信息和“父亲”一般的能量。“海”日夜在召唤着“我”，“夜夜奔来”并“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被层峦叠嶂的无止无境的群“山”围困已久的“我”由此获得了生命意义的启悟和精神的自由。虽然此在的“我”依然没有见过“海”，但已经在想象中对“海”确立起了坚不可摧的“信念”，并确证了“我”的主体存在与身份认同。这就是那个“隐秘的想望/愿望”，就是那颗“从小飘来的种子”，也就是那个一直“缺席的”“不在场”的但又始终“在场”的“父亲”。

因此，至于抒情主体要寻找的是什么样的“父亲”，其第二层意思可理解为：象征现代性的“海”就是关乎这样一个新的文明与文化之“父”的心理情结与诗意想象。对于近现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传统/本土文明与文化之“父”的形象在外来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强力侵蚀下，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抗争中，他的力量和能量已经耗散殆尽。于是，在“八十年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失父/怙”的焦虑以及“寻父”的“想望”已沉积为一种深层的历史与文化无意识。

在前述几篇创作自述文章中，作者都反复强调过“历史记忆”之于作者诗歌创作经验的重要性：“命运就这样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生于五六十年代，从小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在‘文革’结束后又来到大学校园，有人称我们为理想主义的一代，又有人称我们为幻灭的一代。”^{[1]165} 不过，这种“历史”和源自童年的“记忆”一开始就是溃败和挫败的，所幸的是，有了“诗”的启蒙，诗人在溃败之处产生了童年的“痴想”。理性上看，曾经为“理想”而幻灭，因此也只有新的“理想”或“想望/愿望”才能克服这种“幻灭”。这种溃败的历史经验是个人的，也是同时代的，被转喻为诗歌中一次次遭遇挫败的“痴想”，它源自抒情主体童年和生命本真的好奇心，也是源自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无意识。“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我已无数次地见过我在童年时所向往的海，但我心目中的那个‘海’

依然遥不可及。那么,对于现在的我,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依然是‘信念’。如果我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达到这种肯定,那就很难设想我在以后的生活中还会坚持下去。”^{[1]165-166} 正因为作为文明与文化之“父”象征的“海”的非原生性、未可知性和不确定性,当然只有凭靠“信念”方能维系“海”的可靠性。“父亲身份还要求有一种特定的意志行为,父亲身份总是我一种决定,而且总是隐含着一种收养”,“父亲身份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事实,而生理的父亲身份并不足以保证其存在”^{[1]21}。于是,所谓“父亲如山”,但那个传统的、原生的、本土的文化之“父”变成了绵绵无尽的围困和笼罩着我们的群“山”,它“铁青着脸”,它的沉默与阴影笼罩着“我”,让“我”倍感窒息和绝望。“山”给我“打了一个零分”,一次次否定了“我”的“痴想”,但反过来,“我”隐秘的“想望”也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山”的意义。“我”由此并凭借此“信念”超越了“山”赋予给“我”的历史和命运。要实现自我的新生,重建抒情主体的身份认同,只有走出原生性文明与文化之“父”的影子,重新寻找或建构一个替代性的、想象性的“父亲”形象以将“我”“收养”。

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传统的、民族的与本土的文明与文化之“父”意味着“我”的个体生命的缺失,那么,西方文明与文化对“我”的“浸湿”又何尝不意味着一种文明与文化的“诱导”甚至“侵略”?这同样是我们必须要追究的问题。在近现代以来全球化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结构中,“山—海”之间的文化想象和“价值差序”,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诗歌写作者而言,是悖论性的,也是值得反思的。

四、结语

因此,不妨说《在山的那边》中“山”与“海”两个意象的“对立”与“对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或“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变革中的一种观念图式、情感结构或者“认识的装置”。“山—海”作为一个隐秘的“文化—心理”空间,隐喻了由西方文明和现代性所建立的一种不平等的文明/文化的等级秩序,表征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某种缺失。也即是说,在追赶“现代化”并“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等“八十年代”的时代理性和意识形态中,《在山的那边》表征了“八十年代”文学及其写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中精神“失父”与“寻父”的无意识,同时也以“信念”的主题呈示了独特的文化意识。

梳理其文本“谱系”,辨识其所处的“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语境,对重新理解《在山的那边》一诗的“稚气”与“复杂”都有其必要性。打开此诗“山—海”的文本空间之后,我们更应该清楚的是:“西欧拥有海上优势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但将其作为其他时代的衡量标准则会产生误导。”^{[1]3} 因而,重读此诗给我们更重要的启思在于:如何重新理解和处理“山”与“海”之间的现代性问题和意识形态内涵,重新思考回到群“山”之中并寻找一种“反求诸己”或“向内超越”的可能性,对反思和重建当代汉语思想、文化和汉语诗歌的主体性与文化身份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王家新. 山那边的海——关于《在山的那边》[G]//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 [2] 王家新. 在山的那边[J]. 长江文艺,1981(5).
- [3] 王家新. 在山的那边[M]//蓝星诗库·王家新的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4] 王家新. 在山的那边[G]//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5] 刘真福.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说明[J]. 中小学教材教学, 2003(17) (中学文科·第6期).
- [6] 赵寻. 《在山的那边》导读[G]//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
- [7] 王家新. 从前有个少年[J]. 中学生阅读(初中版), 2003(9).
- [8] 王家新. 从前有个少年——关于《在山的那边》的写作[J]. 中国校园文学·中学版, 2007(11).
- [9] 王家新. 从前有个少年[J]. 语文学习, 2008(4).
- [10] 徐勇. 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的发生学考察[J]. 南方文坛, 2018(6).
- [11] 鲁格·肇嘉. 父性[M]. 张敏, 王锦霞, 米卫文, 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9.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between “Mountains and Seas” —*Across The Mountains* in its Text Genealogy

Li Zud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classification and complex text genealogy that the theme ‘conviction’ in the poem *Across The Mountains* was established. Further inspecting the text genealogy of this poem in its classification and replacing it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1980s or “new-period literature”, its unusual mysterious text space behind the theme “conviction” would be opened up. In the paradoxical structure and form of ‘mountains-seas’, the poem represents the deficiency or discontent in the cultural-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1980s, that is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eeking outside” and unconsciousness of “lacking/seeking father”.

Keywords: *Across The Mountains*; “mountains”; “seas”; “seeking outsid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un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孟西]